

我国教育史上 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

（征求意见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前

言

在我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儒法斗争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两个阶级或派别，革新与守旧、前进和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叛徒刘少奇、林彪一伙，苏修叛徒集团，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儒反法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将来。

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上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是政治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宣扬尊儒反法、鼓吹尊孔读经教育，诬蔑“法家无教育”，攻击法家“毁灭文化”，搞“愚昧政策”等等，所以法家教育思想被湮没了两千多年。法家长期以来是被压的。一部中国教育史被篡改成为儒家教育史。这种历史的颠倒，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研究教育上的儒法斗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彻底批判教育上的尊孔读经思潮，肯定法家在教育上的进步作用，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其阶级局限性，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说明。还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把历史的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服务。

这份材料是在北京市教育局党委的领导下，由市教育局理论组、密云二中、海淀第三师范协作编写成的。我们对教育上的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刚刚开始。由于政治水平低，材料搜集得很不够，又加上编写时间仓促，一定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希望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修改、补充。

一九七四年十月

第一讲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 教育上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是我国奴隶社会没落以至灭亡，封建社会代之兴起和确立、巩固的时期。横贯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和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中心，始终是革命和复辟、革新和守旧、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这一斗争反映在教育领域内，就是“以法为教”，还是“以礼为教”的斗争。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法家主张“以法为教”，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革新教育路线；儒家顽固坚持“以礼为教”，是为复辟奴隶主阶级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反动教育路线。先秦著名法家韩非说：“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他认为，法教同礼教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一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这一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法教路线正是在批判礼教路线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春秋时期私学阵地上法家反对 儒家的斗争

林彪反党集团把孔丘吹捧为中国文教界的“明灯”，苏修跳出来帮腔，说什么礼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他们一唱一和，任意颠倒历史。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03年）是我国奴隶制开始衰落，封建制开始兴起的时期。在奴隶大起义的打击下，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和垄断教育的特权逐渐土崩瓦解，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和革新教育的主张开始兴起。这时，自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独占的“官府之学”没落了，私学兴办起来了，后来更全部代替了“官学”。

私学一出世，就开始了法家同儒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孔丘窃据鲁国私学阵地，继续贩卖“官学”的礼教，为复辟奴隶制效劳；同一时期，郑国的邓析兴办私学，大力宣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韩非子》）的法教，批判儒家利用教育宣扬复古倒退的路线。在鲁国，就在孔丘私学的附近，少正卯也办起另一所私学宣传法教，批判礼教。当时是“天下大乱”，“乱”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教育垄断权，也“乱”了孔丘的礼教阵地。“生于末世运偏消”，孔丘私学一出世，礼教就已作为没落阶级的文化糟粕而被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了，哪里是什么“文化珍品”，明明是一堆腐臭的垃圾。

邓析和少正卯大闹学潮，大反礼教。邓析在私学里宣传“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邓析子·无厚》）奴隶主贵族的礼教所宣扬的“神权”和“君权”统统该消

灭，必须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标准来批判和代替周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吕氏春秋·离谓》）主张破旧立新，把历史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奴隶主贵族惊恐万状，竟杀害了邓析，把他剁成肉酱，妄想用白色恐怖来取缔法教。

鲁国法家少正卯专门同孔丘唱对台戏，打击孔丘宣扬“克己复礼”的反动气焰。他用法教鼓励学生要敢于造反，并通过夺权斗争来进行社会改革，坚决摧毁奴隶制上层建筑——礼制。所以孔丘诋毁他“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他又依靠私学议论时政，揭露奴隶主统治的种种罪恶和丑行。所以孔丘指责他“记丑而博”。同时，他把革新主张提到理论高度，教育学生从政治路线上明辨是非，讲得头头是道。所以孔丘诬蔑他“顺非而泽”，“言伪而辨。”（《荀子·宥坐》）

少正卯的法教有极大号召力，以致使孔丘门徒有好几次都投奔少正卯的私学听讲去了，只剩下迂腐的颜回没有敢去。孔丘看到少正卯和邓析“同心”，又博得群众信任，使他的私学形成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因此又恨又怕，终于滥用做鲁国司寇的职权杀害了少正卯，并且暴尸三天。

但是，任何白色恐怖也绝不能压制革命路线的发展。在法教思潮的影响下，甚至使孔丘的门徒在政治思想上也产生了动荡和分化。冉求起先是怀疑礼教，曾委婉地向孔丘提出：“我倒不是不喜欢你的礼教，但是我力量小，复辟不好办。”孔丘马上说他反动性不坚决，指责他“中道而废。”（《论语·雍也》）后来，他索性跑到新兴地主阶级季氏那里做事去了。宰予和樊迟也不爱听那套礼教，一个白天睡大觉，一个宁愿学点庄稼活。孔丘气得骂他们是“小人”。

孔丘的私学，其实是以“克己复礼”为目的，以“学而优则仕”为诱饵，以禁止研究其他各家学说为要挟，招兵买马，拼凑起来的反动政治集团。

当时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就怒斥孔丘办私学“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回家务农），妄作孝悌，而缴幸（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庄子·盗跖》）说孔丘和门徒都是妄想继续爬到奴隶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家伙，痛斥他“修文武之道（礼教）以教后世”，是反革命的强盗行径。这就透彻地戳穿了孔丘私学的实质。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必然也就有多少文化教育主张，绝不可能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文化”。孔丘的私学一出笼，就同时产生了反孔的斗争；而他所贩卖的礼教原是从周代“官学”里继承下来的破烂货，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教育路线。林彪反党集团把孔丘捧做“明灯”，正表明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已面临绝境，只好从历史上寻找孔丘的“鬼火”借光了。苏修的无耻捧场，也绝不能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阶级命运。

二、战国时期法家取缔儒家礼教的斗争

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全面而又急剧的大变革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大多数诸侯国内进一步开展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比较全面、彻底，从而动摇了各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根基，为统一中国创造了坚实的基地。夺权和反夺权、革命和复辟、

统一和分裂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孟轲继承了孔丘的衣钵，倡私学，结私党，钻营奔走，游说诸侯，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复礼”的逆流。随后，荀况和韩非系统总结了前期法家，尤其是商鞅变法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育改革的经验，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法家教育路线、方针和理论，针锋相对，对孔孟的礼教展开了主动的进攻。

战国时期是新兴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决战时期，因此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教育革命的高潮时期。当时在教育阵地上开展了法家同儒家的大规模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

（一）取缔奴隶主贵族的旧教育，还是复辟

奴隶主贵族的旧教育

孔孟之徒擅长把教育作为复辟的工具。“据先王之教”就是他们复辟礼教的反动方针。法家针锋相对，提出“废先王之教”（《韩非子·诡使》）的革新口号，坚持改革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旧教育。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法家旗帜鲜明，总是从政治路线的高度来看待教育问题。商鞅斥责孔丘的礼教是破坏新政治、新经济的“过之母也”（《说民》），即万恶之源。韩非在《五蠹》中系统地批判了礼教，认为礼教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法）、用人政策（术）和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势），也破坏“耕战”政策的实行。他尖锐地指出，“仁义”说教惑乱军心，单纯“事智”而鄙视务农，直接破坏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统一中国的事业，简直是“乱法”、“乱国”、“乱世”的头等害人虫，必须铲除干净。因此，他极力赞扬商鞅

在秦国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的革命经验，进一步强调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耕战教民”的路线，并且主张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教育方针。

“以法为教”，就是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为指导，以政策法规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来彻底改革旧教育。

法家异常重视法令的社会宣传，主张多出告示。定期向老百姓讲解法令，内容要明确、通俗、易知、易行。他们认为在大变革时期这是争取民心的大事。（《韩非子·用人》）

韩非看到，为了“以法为教”，必须“以吏为师”。就是说，把教育大权收归国有，由官吏充任教师，使整个教师队伍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国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场教育阵地上的夺权斗争。当时靠私学营生的孔孟之徒听到这种教育改革的主张和看到法教路线的实行，就暴跳如雷，大吹阴风，说什么守法是“愚”，畏法是“怯”，而“听吏从教”就会使文化教育流于俗浅，是所谓“陋”。韩非随即指出：儒家私学统统是反动政治行帮，必须“禁其行”，“破其群以散其党”，如果让他们有言论自由，就会犯极大错误。（《诡使》）“吏教”和“私学”是“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五蠹》），必须对孔孟之徒实行专政。这一时期韩非提出全盘取缔私学的主张，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就不能实行统一的教育方针。

同时，法家又极力反对儒家“游学”谋官的歪风，力主“以耕战教民”。

战国时期，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没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附属于这个阶级的儒生在社会上构成了寄生阶层。他们游手好闲，啥事不干，“务学《诗》、《书》，皆以避农战”（《商君书·农战》），到处钻营官职。荀况骂这种

人是“恶少”（《非十二子》）。商鞅、韩非主张严禁“游宦”。提倡“以耕战教民”，以便改造这种“贫国弱兵之教”。

法家在制定教育方针的问题上具有战略眼光。他们之所以重视耕战教育，是因为他们力图使教育为“富国强兵”的政策服务，也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统一中国的政治路线服务。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耕战教民”的路线的实质，就是对孔孟之道实行严厉的革命专政，把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教育、耕战教育和社会宣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以便尽可能挖掉奴隶主阶级在上层建筑，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内复辟的旧地基。

列宁指出：“革命把旧地基掘得越深，旧制度复辟就越困难。”（《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旧制度复辟的旧地基在教育阵地上埋藏极深。商鞅的全面变法及其革新教育的历史成就，使得秦国成为统一中国的坚实基地，有力地证明了列宁的这个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林彪反党集团借古讽今，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法家是“罚家”，就恰恰证明他们最惧怕的，是在包括教育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对现代的“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深地挖掘旧制度复辟的旧地基。

（二）培养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革新人材， 还是培养复辟奴隶制的卫道士

反动阶级在没落的时代，总要寄希望于本阶级的继承人。孟轲嚎叫“守先王之道（礼教），以待后之学者”，就是妄想在教育阵地上为新时代尽可能多埋藏一些“定时炸弹”。一脉相承，林彪演出“教子读经”的丑剧，并且把“学

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观点记录在卡片上，奉为座右铭，就再一次暴露了他是一个现代的“儒”。

到底儒家培养的“后学”是什么货色？荀况从两方面刻画了他们的行状：

其一，揭露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略法先王而足乱世。”蝇营狗苟，效法“克己复礼”，大搞复辟。死抱住“世卿世禄”制不放，专门巴结享有继承权的国君“世子”（即正妻的长子），低眉顺眼事奉“世子”的亲信，拉拢“上客”，卖身投靠。一旦当上“世子”的奴才，就心满意足，根本“不敢”有革新政治的意向。这伙人是满脑袋装着旧习惯势力的“俗儒”。（《儒效》）

其次，又揭露他们在思想路线上大搞主观唯心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原来他们根本不懂所谓“先王之道”的实质是什么玩艺儿，只是一味俯拾死人的牙秽，加以任意渲染和编造，乱吹一通；毫无定见，人云亦云，言谈隐晦难懂，也不能自圆其说；起学越蠢，但尾巴翘得挺高。荀况给这号人取了个特别称号叫“沟犹瞽儒”，即长着木瓜脑袋的蠢货；但同时又是“行伪险秽”（阴险卑鄙）、“利心无足而佯（假装）无欲”的伪君子。（《非十二子》）

总之，儒生都是政治上的复古派，因而也必然是利欲熏心，大搞主观唯心论的坏蛋和两面派。荀况满腔怒火，痛骂孟轲培养出这种货色，真是千古罪人。法家极端鄙视这种培养目标，提出了另一套培养变法革新人材的新标准。这种革新人材必须是“智术能法之士”（《韩非子·孤愤》），即忠于变法革新路线和通晓用人政策的改革家。在思想上坚持厚今薄古，“百家之说不及后王（指当代变法的国君）则不听”，道德上也必须“不二（违反）后王”。（《荀子·修

身》)以法治做为高于一切的言行标准。如果国君不正确，那就“从道(法)不从君”。(《荀子·子道》)坚决反对培养复辟奴隶制的卫道士。

这种革新人材必须是“法不阿贵”的“耿介之士”(《韩非子·五蠹》)，即敢于反对奴隶主贵族和儒家复辟派，旗帜鲜明，思想解放，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改革家；是人言不怕，坐牢不怕，乱箭丧身不怕，剃成肉酱不怕，杀头暴尸不怕，车裂分尸不怕的斗士；作风耿直，“虽天子三公问正(政)，以是非对”。(《荀子·大略》)绝不要培养出儒家那种侈谈仁义，貌似“中庸”，善于“避祸全身”的软骨头和两面派。

这种革新人材必须是“言贵其用，行求其功”(《韩非子·六反》)的耕战之士和实干家，而不是专搞“虚旧之学”，一不务农耕，二不学打仗，只会卖狗皮膏药的寄生虫。

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培养目标和教育革命的主张，是为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服务的，是致力于用新的剥削阶级的统治来代替旧的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以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从根本上反对学以致“仕”的教育方针，而只是主张用新的“法士”来代替反动腐朽的儒生。但是，法家对于儒家那种“读书——做官——复辟”的反动教育路线的揭露和批判，在当时确是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和战斗性的。

(三)用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教育工作，还是用主观唯心论搞关门读书、闭门修养

在教育阵地上历来就存在着唯物论同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的斗争。孟轲把孔丘的主观唯心论加以发挥，提出“仁、

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的谬论，并在教育上编造了一套“存心养性”、“反身（自省）而诚”的“修养经”。这完全是没落阶级培养残渣余孽的教育办法。他们仇视现实的变革，因此妄图教育他们的徒子徒孙“修养”出一种“主观战斗精神”，来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刘少奇、林彪一伙贩卖“灵魂深处修养”论，其反动实质也正在这里。

法家一贯反对儒家的“修养经”。商鞅指出：儒家所谓“修善”、“反身而诚”，乃是培养“虱子”（吸血鬼）和奸民的办法。（《商君书·靳令》）因此务必除奸去虱。韩非痛斥闭门读“经”，专门在磨牙炼齿上下工夫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他认为“修文学（指儒“经”），习言谈”是“愚诬之学”，只能培养出“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的嘴把式。（《五蠹》）

因此，法家主张根绝这种“愚诬之学”、“虚旧之学”，力倡所教所学应抓当务之急的大事，而“不急之察（研究），无用之辨（理论），弃而不治”（《荀况·天论》）。他们讲“功用”，务实学，力图使教育为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现实斗争服务，把现实需要的教育内容摆在第一位。

他们主张读法令之“书”，但反对死读书，重视在办事过程中进行锻炼，增长才干，“举事而才，自炼”（《商君书·封疆》）。韩非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武将必须从行伍出身，文官也必须有基层“州部”的经历。

荀况把法家的这种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加以理论概括。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他强调必须把理性认识和直观感知相结合，而

理性认识高于直观感知；“知”与“行”相结合，而“行”是“知”的目的，“行”重于“知”。尤其重要的是，荀况认为只有“行”才能验明所学得的知识。这个论点表明法家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路线的深刻性，有力地打击了儒家“生而知之”和“内省”、“修己”的一套腐朽的教育理论，为法家培养革新人材和提倡耕战教育建立了理论基础。

但是荀况的认识论是有他的阶级局限性的。他所说的“行”，只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圣贤”、“君子”的个人实践活动，而不是社会实践，不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革命实践。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具有变法革新的动机的“圣贤”、“君子”，才可能做到“行之明也”，而所谓“小人”是办不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旧唯物主义……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事物，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法家在社会观上的历史唯心论，就成为他们认识论的局限性的思想根源。

然而，荀况所说的“圣贤”、“君子”同儒家培养出来的“贱儒”、“俗儒”又截然不同，实际上是指“事必当务”，“张法而度之”（《荀子·王制》）的大法家。他认为，如果起用这种大法家治国家、办教育，“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荀子·儒效》）。荀况逝世后的十七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法家的教育革新路线。

三、秦统一至西汉前期法家反对儒家妄图复辟礼教的斗争

（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法教，打击礼教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

建帝国。秦王朝建立以后，摆在它面前的根本问题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还是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当时这场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秦始皇以法家李斯为辅佐，继续实行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路线。反映在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立先王之教”还是“废先王之教”，换言之，是推行法教，还是复辟礼教。这是先秦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依靠法家李斯，雷厉风行地推行法教路线。在中央设博士官，领导文教工作，并参议政事，在乡里则设“三老”官吏，专管法教事宜。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教育路线。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战国时期“文字异形、言语异声”（《说文解字·序》）的局面，秦始皇颁发改革文字的政令，用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字，实现了“书同文”。他还令李斯等人用小篆作《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和全国统一文字书写的范本。文字的统一为政治统一和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秦始皇统一政治的革新措施，使反动儒生惶恐万状，他们妄图把复辟的希望化为复辟的行动，因此以设坛讲学为名，“私学相与非法教”，“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结成死党，妄图颠覆郡县制，复辟分封制。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对他们进行了坚决镇压，这就是轰轰烈烈的“焚书坑儒”运动。这是新兴地主阶级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对文化教育也进行了重大革新：取缔儒家私学，焚毁儒家反动经典；坑杀反革命儒生，对奴隶主贵族实行革命专政；重

申法家的教育路线。“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保护民族的进步文化。医药、种树等科技书籍，不在焚禁之列。

据近期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证实，秦始皇烧掉的只是儒家反动典籍，而其他诸子书籍都保留下来了。其实当时所镇压的也只是那些结党叛乱的反动儒生而已。

林彪及其死党效法历代反动派，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污蔑法家“毁灭文化”，胡说法家是“罚家”，完全是颠倒历史，其目的是借古讽今，妄图诋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林彪妄图开历史倒车，那就只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二）西汉前期教育上法家反复辟的斗争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点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数百万农民和奴隶参加了起义军。这次起义推翻了赵高所把持的秦王朝政权，沉重打击了六国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也猛烈地扫荡了儒家反动思想，为汉王朝的建立，为以后继续推行法家政治路线和教育路线扫清了道路。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相当激烈。斗争的焦点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还是复辟分封割据的奴隶制诸侯王国。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总代表刘邦及汉初各代皇帝，从吕后直到宣帝，坚持了法家路线，坚决镇压了搞分裂倒退的各诸侯王的叛乱。重新统一了中国。这一时期在文化教育

领域里，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教育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服务，还是为反动诸侯王的分裂路线服务。

汉承秦制。在教育上，汉初继续实行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革新路线。建国初，高祖刘邦就下令中央设博士官，全国各地地方乡里维持秦朝“三老”官制，并在县增设“三老”专职，掌管法教。刘邦“不信儒”，所以坚决反对庠序之教。《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初不搞“庠序”之教。其后，自吕后起，文帝奖“三老”，景帝“不任儒”，武帝“以法律为《诗》《书》”，（《汉书·盖宽饶列传》）并多次下令奖赐县、乡“三老”。（《汉书·武帝纪》），宣帝也实行法教，反对“德教”和“俗儒”，骂儒生“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斥“德教”扰乱人心，使人们不知所从。（《汉书·元帝纪》）因此，法教路线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它应有的作用，从而取得比较巩固的优势。

儒家为了达到复辟分裂的愿望，贼心不死，仍然作垂死的挣扎。当时的诸侯王同奴隶主残余势力勾结在一起，成了反动儒生的保护伞，如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分裂和复辟的目的，广招儒生游士，而儒生好象逐臭的苍蝇，又纠集于江淮之间，以著书讲学为幌子，以道家“清静无为”之说作掩护，大搞尊儒反法，攻击汉初的法家路线。在教育方面他大肆鼓吹“德教”，叫嚣“德足以教化”（《淮南子·泰族》），反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路线。他吹捧孔老二和奴隶制教育，所谓要“入学庠序，以修人论”（同上），以此制造舆论，发动叛乱，最后被镇压了下去。儒家打着“礼教”的幌子搞分裂叛乱的阴谋，以可耻的失败而收场。随后，董仲舒跳出来大放厥词。在教育上攻击“废先王之教”